

L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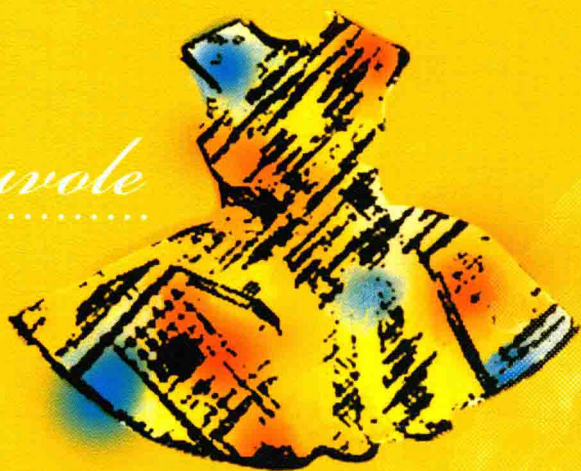
〔意〕阿尔贝塔·巴萨利亚 —— 著
陈 英 ——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nuvole

di

Picasso



毕加索
的
云彩

解放疯人院历史中的
一位小女孩

毕加索
的
云彩

解放疯人院历史中的
一位小女孩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-2016-8936

Le nuvole di Picasso

© 2014 by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Editore, Milan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毕加索的云彩 / (意) 阿尔贝塔·巴萨利亚著; 陈英译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02-011912-7

I. ①毕… II. ①阿…②陈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
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5811号

责任编辑 陈 旻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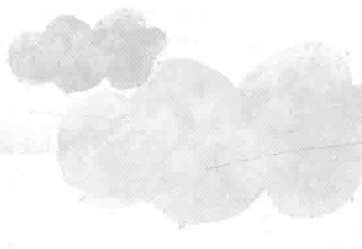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58千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3.75 插页3
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912-7
定 价 4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目 录

- 
01. 橙色的小围裙 / 001
02. 斜眼看世界 / 003
03. 戈里齐亚 / 009
04. 威尼斯 / 010
05. 托尼先生的咖啡 / 014
06. 在路上 / 016
07. 家 / 020
08. 毛线 / 027
09. 裙子的革命 / 031
10. 便携式打字机——莱特拉 22 / 033
11. 童话 / 038
12. 伦敦帕特尼区 / 040
13. 开着窗子放音乐 / 043
14. 一九六八年 / 049
15. 纽约西区 / 053
16. 滴水的叶子 / 059
17. 疯子 / 061

18. 小山羊 / 065
19. 《阿贝莱的花园》 / 067
20. 深夜的电话 / 072
21. 红白格子桌布 / 074
22. 罗马娜 / 077
23. 在汽船上 / 081
24. 被遗忘的孩子 / 085
25. 死亡 / 091
26. 加布里埃拉 C. / 094
27. 地毯下面的灰尘 / 098
28. 我的画布 / 100
- 作坊的内部 / 106

01. 橙色的小围裙

我从帕多瓦来到戈里齐亚，我把“蒙台梭利”学校的橙色围裙带到了新小学。这时候，我看到其他女生的围裙都是白色的，上面顶多有一朵粉色小花。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橙子，在一片雪花莲里滚动。当时有一位英国姑娘，她叫卡洛琳，她负责接送和照看我。她是留学生，顶着一头天蓝色的头发，那并不是她想要的颜色，只是因为 she 从来都调不好染发剂的颜色。她也并不是模仿伦敦的“摇摆”范儿，才故意穿得那么破烂和随意。卡洛琳经常来学校接我，但我从来都不让她和我的同学说话，免得让别人听出她是外国人，一般都是我替她说话。我是学校惟一一名新来的学生，穿着橙色围裙，其他同伴都穿着白色围裙。她们已经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了，加上英国保姆这种怪异的事情，使我显得更突兀。卡洛琳之后是凯瑟琳、辛迪，然后是维罗妮卡，还有另外一个卡洛琳、一个简，后来还有詹妮特、玛丽、琳达，这些英国保姆一直陪我十三岁。

过了一年我才明白，我的怪异行为对别人产生了影响：不是别



的，正是我的怪异表现之一——围裙的颜色。第二年十月，大家开始换大号围裙时，班里涌现出了一些非主流的颜色，像我围裙颜色一样，有点疯狂。一年前，班里白色围裙占主导，只有惟一一件橙色的，现在增添了红色、天蓝色、绿色和黄色。小学五年级时，这种风气传染得更厉害了，整个班像一道道欢快的彩虹。我能影响到别人，这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但是那些外国保姆，还有我的歪脖子，都只是我自个儿的事，传染不到别人身上。很多年之后，那些外国来的留学生，慢慢变得普及，很多家庭都接待过她们，但是我的歪脖子，仍然只是我自个儿的问题，因为我眼底的病，斜着眼睛，是我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。

02. 斜眼看世界

那两个命中注定成为我父母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自己选择的，应该说，他们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：男的、女的、疯子、病人、孩子、病孩子，无论是谁，都应该过上他们自己的生活。这世界上存在疾病，这一点毫无疑问，但是疾病不能妨碍一个人生活，也不能阻止别人和生病的人在一起生活，我和我残缺的眼睛也属于这个范畴。我的疾病让我切身明白这个道理。在我两岁的时候，父母带我去日内瓦，找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看眼睛。我们来到一家宾馆，那时候天已经黑了，那个医生来房间给我看病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尽管我眼底的病变可能会导致我失明，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限制，我可以用我的方式看世界。和其他小朋友一样，我早上走路去上学，我妈妈在后面远远跟着我。我一个人去上学，或者由我哥哥恩里科陪着，我哥哥可是个勇敢、战无不胜的人。他就是我的佐罗、我的小王子，既温柔又聪明，他还是我的“尼莫小子”（美国电影《超人》的意大利版本，因为版权的缘故，保留原来的



名字太贵了，就换了个名字，在意大利，连超人胸前的“S”也被去掉了）。

弗兰卡从来都不会插手管我的事情，我也都过来了。她允许我去滑雪，她问我：“你怎么滑的啊？”“我闭上眼睛滑啦。”她打了一个寒战，但也没有阻止我。我还去“维纳斯”篮球队打球，我闭上眼睛传球。记得有一次比赛，我的投篮对球队获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我闭上眼睛投球，后来球进了，全场一片喝彩，真是比电影还精彩。在学校里我也没受到什么限制，为了能看见东西，我斜着脑袋。总之，我眼底的那些斑点，让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看东西，实际上我基本看不见，这就是我要与之共存的现实，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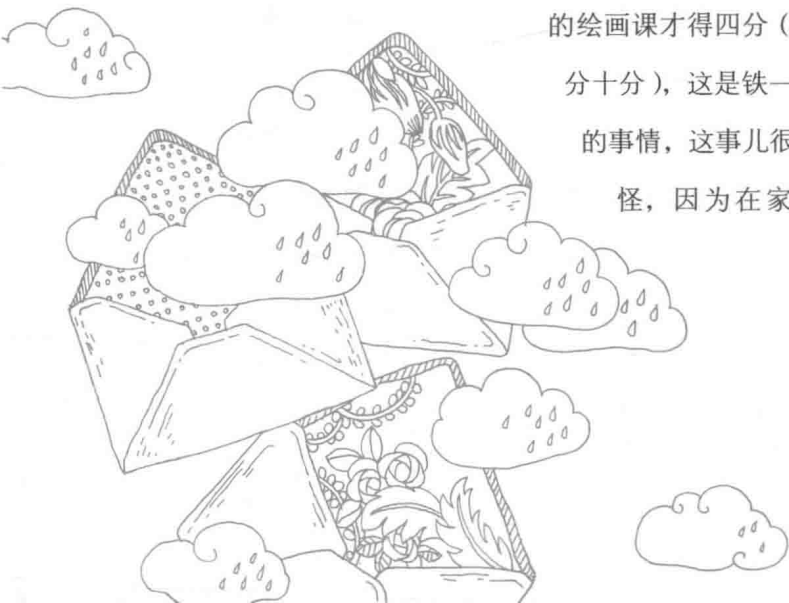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和别人一样，面对生活的任何事情。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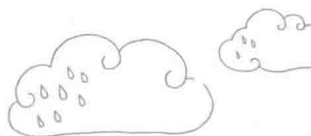
的绘画课才得四分（总

分十分），这是铁一样

的事情，这事儿很奇

怪，因为在家里





我是大家公认的艺术家。

我最擅长的是画飘浮在蓝天上的云朵，我最喜欢那种散装的大纸，这样我就可以打破学校条条框框。在我的天空中，居住着偶然出现的云朵，它们并不完美，但是自由自在。我的斜视目光形成的万花筒，会产生一种特殊效果。“这种蓝色色调真是太神奇了。”家里的大人都这么表扬我。我爸爸经常对我说：“这些云朵真是太美了，你真应该把它们寄给毕加索，他一定会非常喜欢。”在我们家里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，在普通人和大明星之间，没有什么鸿沟、分割和不可跨越的界限。因此我可以把我画的云朵装进信封里，寄到毕加索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十二年生活的地方——蔚蓝海岸的穆然小镇（Mougins），圣母街的一栋普罗旺斯大别墅里。惟一的问题是：我应该在信封后面写上他的全名，还是简单写个毕加索？我不了解法国邮政，但是我可以想象，假如他们非常精确，那我就要写全名。我琢磨着怎么把那么长的名字——帕布罗·迭戈·荷瑟·山迪亚哥·弗朗西斯科·德·保拉·居安·尼波莫切诺·克瑞斯皮尼亚诺·德·罗斯·瑞米迪欧斯·西波瑞亚诺·德·拉·山迪西玛·特立尼达·玛利亚·帕里西奥·克里托·瑞兹·布拉斯科·毕加索（Pablo Diego José Francisco de Paula Juan Nepomuceno María de los



Remedios Ciprian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Ruiz y Picasso) 写在信封背面。虽然很复杂，但也不是不可能，因为我要用一个大气封装我的云朵。遗憾的是，最后我决定，不把那些云朵送给毕加索先生。我想，把这些云朵给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真想不出。我又弯下腰，若无其事地画起画儿来。这些云朵从来都不属于他，它们也不需要别的欣赏者，更别说是个坏脾气的西班牙老画家了。尽管对所有人来说，这些画儿都是“毕加索的云彩”。

尽管如此，一直到初中三年级，在学校我都属于在绘画方面没什么天分的学生。最后我决定赌一把，我要画一只美丽的天鹅。我在纸上画了一只昂首挺胸的天鹅，还有鹅掌，那些循规蹈矩的孩子们画的天鹅，都是没有腿的，它们都浮在一面平静的湖水上。后来老师还是给了我四分，这可能就是我初中绘画课最后的成绩。怎么办呢？在家里，大家都说我应该练习一个绘画主题，然后靠这个主题得分，我要牢记每个细节，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。在堂哥维托里奥的帮助下——他是一位画家，我选了威尼斯的圣保罗广场。我记住了所有的细节：阴影、石头路、长椅、建筑的正面。我对着一张白纸，歪着脖子，一点一点把它画出来，我尽量按照风景画的每个要求来画。考试的日子到来了，题目是：描绘一首诗歌。

我马上产生了一个完美的想法，我选择的主题是《暴风雨之后的平静》。我把我练习好的广场做了一个改动：在图画中间，加了一潭漂亮的积水。我最后的成绩是八九分，全家都很高兴。对于那些画天鹅不画腿的人，这应该是一个教训。

关于我的眼底，这是我和爸爸之间的一场对话。

“过来，坐在我的怀里，给我说说你看到的東西。”他对我说，“比如说，你看那盏灯，你是怎么看的？”

“我看那盏灯很大，就是很正确的大小。”

“怎么个正确法？”

“正确的。”

“正确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正确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就是正确的大小。这样的。”

“但是你的手比画的，比我的小啊。”

我们的手放在一起，展示出的大小是不一样的，“好吧，那你看看，这张椅子有多大？”

“就是它实际的大小啊，就这么大。”

“那个窗户呢？”

“窗户也是正确的大小啊，这么大。”



“窗子多远啊？”

“很远……不远不近，或者很远，比较近的远……不是。好吧……

总之，窗子就在那儿。”

一点儿也说不清楚。我们就这样几个小时坐在那里交谈，但是却说不明白，总之，就是疯子说话时会出现的情景。

03 戈里齐亚

戈里齐亚有点儿像柏林，有一道墙穿过城市，我记得那道墙好像是红色的。一道金属栅栏把“跨阿尔卑斯”广场分成两半，把爸爸工作的那家精神病医院的公园也分成两半。在帕多瓦大学的医疗室，佛朗哥伸展不开手脚，因为他的研究工作是把心理学和哲学结合起来。他的研究侧重的不是心理学，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。他感兴趣的不是疾病，而是病人。就这样，大学就把他“清理”出去了，把他流放在弗留利大区的戈里齐亚市，我们全家都跟着他迁徙了。这个城市的郊区、火车站，还有火车站前面的大广场，都属于南斯拉夫，剩下的地方属于意大利。人们来来往往，都有居民通行证，但是那道墙上有很多洞，很轻易就能钻过去。“从波斯尼亚来的农民”，家在戈里齐亚，他从斯洛文尼亚新戈里察（Nova Gorica）来。火车站那里有红五角星和一排字：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！”写在火车站正面，那些字一直保留到一九九一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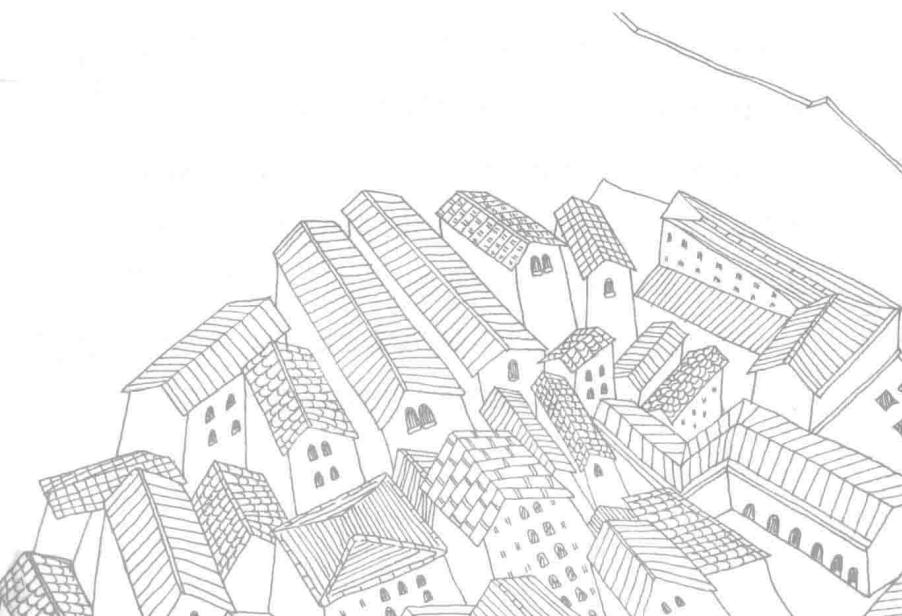


04 威尼斯

我们其实是从威尼斯来的，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威尼斯。这种来来去去，对我来说一直是种折磨。我错过了“维纳斯”篮球队所有在星期天举行的比赛。另外，我还错过了和朋友们在星期六下午的聚会，还有出去逛的机会。去威尼斯真是一个负担，但好处是可以见到我奶奶，还有维托里奥堂哥。对我来说，那真是一件好玩的事情，因为维托里奥不是一个普通的堂哥，他年龄比我大，他就是那位教我闭着眼睛画出圣保罗广场的画家。在工作室里，他总是画那些尺寸很大的画儿，他喜欢画马。去威尼斯的那些周末，我作为画云彩的专家，被任命为他的助手，我要在大得无边的画布上画背景，有时候那些画布长达二十米。《儿童十字军》那幅画一共二十四米长，每一厘米都描述着惊心动魄、让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事件，展现了中世纪一个主要事件：有一支由儿童组成的十字军，在一个名叫斯特凡诺的牧羊人（几乎是一个神笛手）的带领下，决定去圣地攻打摩尔人。事情发生在一二一二年，一小队人马，

从一个叫卢瓦尔的小村庄出发，一路上队伍越来越壮大，他们先到了巴黎，然后到了马赛。他们登上了几个商人为他们准备的七艘船，向圣地出发。但是到撒丁岛附近的时候，船队遭遇了风暴，那些幸存的孩子被卖到埃及做奴隶。有很多奇遇需要描绘，维托里奥本来可以画很多张画儿，但是他选择了把所有故事都画在一张画儿上。他之所以画得这么长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：这些画是论米来卖的，就像卖布一样。

除了维托里奥，威尼斯还有我最喜欢的切奇莉娅奶奶：她总是戴着有面纱的帽子，因为她做过老师，而且为争取妇女参政做过斗争，她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非常自豪。她很喜欢给我们讲故事，



在那些故事中，她喜欢提起一篇作文，那是她教过的无数学生中的一个写的，一篇非常简洁，但激动人心的作文，写得栩栩如生，“我拿起鞭炮，放在铁片中间，妈妈她们来了，我把鞭炮点着，大家吓得撒丫子跑了。”她讲这个故事时，她那双深邃、愉快的浅灰色眼睛，总是在笑。除了记得学生的故事，她还给我们讲弗朗哥被捕的事情。她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一九四四年，弗朗哥当时参加了游击队。有一次，法西斯来抓他，他已经逃到了屋顶。在威尼斯，你可以从一栋房子跳到另一栋房子上，如果房子不是挨着的话，房子之间最多只有一条小胡同把它们隔开。这些胡同非常窄，轻轻一跳就过去了。但是切奇莉娅奶奶觉得这样太危险了，她害怕了。她当时非常担忧，当着那些警察的面，不由自主地对弗朗哥喊：不要从屋顶上逃跑！就这样，警察很轻易就把他逮住了，马上把他送进了监狱。监狱里还有其他人，那些人中有一位告发他的“好朋友”，那就是阿尔贝托——我妈妈的哥哥，这又是后话了。爸爸是怎么进去的，他从来都没有说过，但幸亏我奶奶记得，她提起这事儿时，总是说得那么轻松有趣。

在街上，人们总是看到我奶奶穿着裘皮大衣，脚上蹬着拖鞋买东西，这并不是因为她不修边幅，只是因为她忘记穿鞋了，因为